

汉书选译

本书责编：何志华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套

ISBN 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 元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

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一

《汉书》（也称《前汉书》）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它详尽地叙述了西汉王朝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以至中西交通、文化交流等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西汉社会的一部主要著作。

《汉书》的主要作者是班固（公元32—92年）。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的祖父班稚在西汉哀帝时作过广平（今河北鸡泽县一带）太守。父亲班彪，字叔皮，在东汉光武帝时作过徐县（今江苏泗洪县南）县令和司徒府的属

官，后被推荐作了望都县（今河北望都县）长吏，52岁时死在任上。班彪一生从事续补《史记》的工作，共写出《后传》六十五篇，这些著述后来成了班固写作《汉书》的重要依据。班固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学术气氛的家庭，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班固青年时候进入首都洛阳的太学读书，学习前代典籍，博览诸子百家，为以后的著述打下了坚实基础。班固读书不死抠词句，只求弄懂文章的中心意思，这对于形成他从大处着眼、纵观古今的历史眼光可能有一定作用。班固虽然博学多才，但并不自傲，而且性情宽厚，能够容人，所以受到当时读书人的敬仰。

父亲死后，班固回到家乡居丧。这时，他着手整理《后传》，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汉书》的编写。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告发班固在家私修国史，因而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迅速赶到洛阳，上书替他申辩。明帝看了书稿，很赏识班固的才能，就召他到首都，任命他做兰台令史，掌管皇家图书馆，并正式令他编写《汉书》。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班固精思熟虑，专心写作。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随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登燕然山，窦宪“刻石勒功，纪汉威德”，由班固写成铭文。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图

谋叛乱，事情败露而自杀。班固因此被免官，为人所陷而被捕，死在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死时，《汉书》的大部分篇章已经成稿，只剩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出，和帝就令他的妹妹班昭（也称曹大家）继续补写八表，后来马续又帮助班昭写成了《天文志》。前后经历三四十年，一部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

二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帝纪按照年月记述了西汉一代十一个皇帝及吕后的事迹。表分别记录了汉代王侯贵族的世系，秦汉官制沿革、汉代大臣的任免，以及为数众多的历史人物。志叙述古代到汉代的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列传记叙了汉代三百多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以及边疆各族的历史和邻近各国的情况。

武帝以前的史实，《汉书》多沿用《史记》的文字，班固只作了少量的改动和必要的补充。武帝以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纪录，则是班固以班彪的《后传》和各家续《史记》之作为依据，加上自己

收集到的新材料而写成的。

班固把《史记》的《礼书》、《乐书》合为《礼乐志》，把《律书》、《历书》合为《律历志》，把《平准书》改为《食货志》，把《封禅书》改为《郊祀志》，把《天官书》改为《天文志》，把《河渠书》改为《沟渎志》。此外，他还创造性地增写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和《艺文志》等四篇重要的志，填补了《史记》的空缺。在武帝以下他又增写了七篇帝纪和一百多个人物的传记。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经班固略加改变而确立为纪、表、志、传四种体裁的断代史体例，就成为后世编著断代史的标准形式。

班固编著《汉书》，除了他的家学渊源和个人志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适应东汉统治阶级的需要。东汉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激烈斗争中产生，为巩固封建统治，缓和阶级矛盾，就需要总结西汉的历史经验。班固在《叙传》中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武帝年号。公元前104—101年）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这里，班固只说明了写《汉书》的两个起

因，一是司马迁贬损刘邦的功德，在《史记》中给他排列的位置不当，一是武帝以后历史出现了空白，须要续补。然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却没有明说，那就是他断代为史，是为了给东汉统治者提供一部前朝兴衰成败的历史，让他们以史为鉴，汲取经验和教训，求得长治与久安。班固在每一篇末尾的论赞中，都对本篇的人和事作一番简要的评议，论是非，寓褒贬，态度明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动机。

三

《汉书》以其规模宏大，内容精深著称于世，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西汉一代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研究西汉社会的丰富史料，它在中国史学著作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汉书》十志从《史记》的八书发展演变而来，在内容的丰富和叙事的周详方面又超过了八书。尤其是其中新增写的《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篇，为史书开拓了新领域。《刑法志》记述了西汉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是一部上及周秦的古代法律简史。《五行志》虽然贯串着迷信思想，但保存了大量有关气

候异常、山崩地震、日食月食的纪录，是一份珍贵的科学资料。《地理志》叙述了上古九州的山川地理，物产分布，西汉时期郡县封国的建置和变革，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民情，以及海外交通等等，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艺文志》记载了西汉官府的藏书目录，分析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和派别，是研究古代文化思想和图书流传等方面有价值的著作。其它六篇志，虽然源于《史记》，但都作了较大的改进，补充了不少新内容。如《食货志》，就把只局限于记述西汉经济制度的《平准书》，扩充为上自周秦，下迄王莽的一部经济专史。自《汉书》变《史记》的八书为十志，后世编修正史多以此作为依据，有所增减而已。

《汉书》的八表，主要纪录了西汉一代王侯将相的任免废立情况。其中《百官表》兼及秦代官制，《古今人表》列举从远古至秦末的重要历史人物，突破断代体例，补充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中占篇幅最多的是帝纪和列传两部分。补写的《惠帝纪》及武帝以下的七篇帝纪按时间顺序脉络清晰地记载了连续发生的历史事件，保存了许多重要的诏令。至于列传，内容就更丰富。除开《史记》已有的人物，班固新写了武帝以后一百多个人物的传记，极大地充实了西汉的历史。他们

之中有战功赫赫的将军，有威武不屈的使节，有极力维护皇权的大臣，有权术圆通的野心家，有草菅人命的酷吏，有重义轻生的游侠，有皓首穷经的学者，有腰缠万贯的巨商，还有争宠的后妃，厚颜的佞幸，等等。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活动，可以了解西汉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此外，班固继承《史记》为边疆内外各少数民族和国家立传的优良传统，在《史记》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增补，写成《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三篇，记述了汉代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内外各族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汉朝和平交往、战争争夺的历史，是研究我国古代边疆兄弟民族及邻近的亚洲国家历史的珍贵资料。

《汉书》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史书，也是价值很高的古典文学名著。作为一部早期的史学著作，它还没有完全与文学分离开，仍旧保持着文史合一的特点。不过，当史学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两者不能兼顾时，班固总是把史学摆在首位。这就是为什么《汉书》的文学性不如《史记》那样普遍，而史学意义却有所增强和发展的缘故。作为史学，《汉书》是断代史的开山之作，作为文学，它又是汉代散文的代表作。班固本人就是个辞赋家，所以《汉书》的文字很讲究，词汇丰富，句法灵活，语

言凝炼，结构严整。他还善于根据真实的材料，选择典型的事例，运用各种文学描写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人物作精细的刻画。因此，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大多写得生动可信，少数人物形象逼真，呼之欲出，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此外，《汉书》中还汇集了许多西汉作者的政论和辞赋作品，为后人保存了可贵的文学资料。

四

班固生活在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肯定和加强的东汉初期，从小就受到封建主义的正统教育，与皇室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封建正统思想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占居着主导地位，这是不难理解的。此外，班固还继承了班彪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认为汉朝的兴起是受命于天的，给社会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蒙上了神秘色彩。这些正是班固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之所在，读《汉书》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然而，班固毕竟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总是尽量客观地记述历史事件，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他既颂扬“德政”，也揭露社会矛盾，贬斥王公贵族的骄奢与残暴。甚至对武帝，班固也不作全面肯

定，他在赞语中就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改变）文、景之恭俭（谦逊节俭），虽《诗》、《书》所称（称颂），何有加焉！”由于他尊重客观事实，所以比较了解民众的疾苦，同情人民。利国利民的他就赞扬，祸国殃民的他就反对，态度很鲜明。他把各族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称为“盗贼”，这正是他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的局限，但他并不回避矛盾，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使得民力耗尽，无以为生，才引起人民的武力反抗。如他在说到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时就指出：“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这些，都是《汉书》中进步的方面。

五

《汉书》问世之后，由于比较难懂，到东汉末期，就有服虔、应劭开始为它作注。唐初颜师古汇集汉、魏以来二十多家的注释，纠正错误，补充缺漏，成为古代最详备的注本。清末王先谦更汇集了颜师古以来数十家的见解，加以考证，作成《汉书补注》，是现代最完备的注本。解放以后，由中华书局印行的标点本《汉书》，采用《汉书补注》作底本，只收颜注，不收补注，又参考其他版本作了

校勘，简明易读，是目前流行的最佳版本。

本书根据中华书局标点本，选出文史兼顾、可读性强、具有代表性的十一篇传记，译成今语，加以简要注释，以供一般读者阅读。在选译过程中，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给予大力支持，宗福邦、陈世铄两位先生阅读了全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致谢忱。

一九八七年九月